

西方社会的都市性及其启示

刘 勇

摘要 西方社会的都市性蕴藏着压迫与解放的辩证法。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阶段,都市社会的空间生产形式包括城市规划、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日常生活,它们共同生产了都市性,即都市的集中性、扩张性和差异性。都市的集中性剥夺了居民的生活权利,扩张性造成了居民生活主体性的丧失,差异性导致了居民的生活异化。都市的压迫与解放是一一对立统一的矛盾。都市居民凭借都市革命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活方式的解放:实现诗意的栖居和进入城市的权利;揭露和反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提出对日常生活异化的“自否定”——自我否定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认同,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鲜活性 and 创造性。西方都市社会的空间生产创造了一种高度发达的都市性文明,也给都市居民带来了压迫和剥削。当代中国应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市文明道路,创造人类都市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都市马克思主义;城市规划;消费主义;都市文明

中图分类号 B089.1;D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5-0105-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01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是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人们自然地将城市与美好生活联系起来。中国大多数人民长期生活于传统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辛勤劳作,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进入近现代社会后,中国部分人口被迫卷入城市化进程,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从小城镇进入大都市的文明生活。因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开启工业革命之后迅速推动了城市化,西方的都市文明从而走在了世界前列,所以成为包括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城市学习和借鉴的榜样。当部分人以“乡下人”或小城镇的心态仰视、崇拜西方城里人或大都市的都市文明,甚至在高唱西方都市文明赞歌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西方社会都市性带给人们的物质上的、精神上的以及社会上的压迫。这种压迫让我们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文明并非如肉眼所见那般更美好,西方资本主义都市社会也并没有真正让大多数人的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直译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这句主题口号实际上朴实地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超越资本主义都市文明道路的愿望和决心。

一、都市社会的降临

20世纪法国“五月风暴”以来,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推动了工业社会进入都市社会阶段,都市性降临并凸显。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较早地敏锐发现都市性降临的总过程。在他看来,空间生产包括两方面含义: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1](P47)。空间中事物的生产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它存在着商品过剩和长期来看的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这种生产形式没有考察到空间生产的其他形式。资本主义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不单只是去生产空间中的商品,而且还生产空间本身,即装载商品的容器——城市空间(工厂、住房、大型商场等消费场所)。资本主义通过城市化、郊区化、内城改造、城市更新等空间生产的方式来生产人造空间,将各种空间重组和改造之后纳入总体性的空间生产体系

当中。空间本身的生产形成了空间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空间化。前者指出了资本逻辑将空间强行纳入资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体系的过程,空间被纳入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后者是指资本为了突破区域限制,将物理、精神、社会空间整合起来进入全球化生产。为了进一步推进全球化生产的总体性维度,资本将情感、感受等生命政治的生产囊括在总体性的空间生产中。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集中了都市财富的生产、都市经验与意识的生产,并将其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全球都市化、甚至星球都市化的阶段。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催动了都市社会的到来,促进了都市与社会的转型,都市在支配和塑造社会的发展中作用越来越大,从而产生了都市性。

国外学界对都市性降临过程的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70年代初,英美城市学家和地理学家第一次开始讨论列斐伏尔关于都市空间性(urban spatiality)的研究方法”^[12](P763)。都市性或都市空间性是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列斐伏尔认为,资本增殖的方式已经从空间内的生产转移到空间本身的生产,即由资本的初级循环过渡到次级循环,从而导致都市性降临。但是大卫·哈维批判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从资本的初级循环转移到次级循环的背后原因,认为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其初级循环向次级循环的转移,“阶级垄断地租”是其转移的动力机制的承担者。哈维分析了都市的集中性和扩张性产生的经济过程,从资本的循环来分析都市性思想,但缺少将资本的生产与循环结合起来分析的辩证法视角。曼纽尔·卡斯特通过研究政府削减对住房等集体消费支出,来分析产生都市扩张性的政治过程。爱德华·索亚从第三空间的边缘性、混杂性、分散性、碎片性、虚拟性、开放性等方面来分析都市差异性产生的文化过程。

国内学者陈忠开展了城市现代性的研究,为研究都市性降临的过程提供了多维度的基础条件^[13](P102-108),但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工业社会的现代性是以工业化带动的现代化为主要动力,而都市社会的现代性则以都市化为主要动力。“都市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重点落在了被城市内爆/外爆成为一个普遍的城市结构的最近‘临界区’,并且工业化的总问题为都市所替代。”^[14](P33)为了把握都市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区分工业社会的现代性,笔者认为可以在都市化的基础上提出都市社会的“都市性”(urbanity)概念。邹诗鹏提出了“都市际性”或“城市际性”(interurbanity)概念,分析了都市性降临的集中性和扩张性内容,但相对忽视了差异性。都市性意味着聚焦、中心性,城市际性意味着疏离、分散^[15](P138)。都市性的内生性矛盾表现出都市性的集聚、扩张,与之相对的是聚集效应外溢的都市际性。都市的集聚外溢实质上是都市性矛盾的两个方面,是都市规模同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市际性或城市际性的概念以都市规模作为都市本体,没有看到资本对都市规模的塑造,无意识地将都市的中心边缘权力不平等作为其他领域的事情,这实质是将都市去政治经济学化,也没有充分看到都市性带来的压迫。这个观点还忽视了与同一性矛盾相对的差异性,该差异性体现为都市的日常生活。都市的日常生活是与同一性矛盾相差异的社会实践,体现了都市居民对生活解放的追求,也体现出对都市性同一性矛盾的批判。此外,列斐伏尔认为空间生产的形式对都市性降临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他没有明确展开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与都市空间生产的关系以及空间生产的定义。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是指资本家通过城市规划、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来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或活动,它们共同导致了都市性的降临。空间生产的结果是生产了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也成为下一次空间生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空间生产均是社会空间生产,一切社会空间生产也是空间生产。社会空间生产有多种形式,当制造业开始衰落时,就会进行产业转移,建筑业、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业因而发展迅猛。城市化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都市空间是社会空间的主要载体,都市空间生产是社会空间生产的主要动力和内容,因此从内容上看,社会空间生产主要指都市空间生产,三者的关系是一致的。空间生产是都市性降临的直接原因。列斐伏尔等国外学者注重都市性降临的事实分析,国内学者大多侧重其规范意义。笔者将事实分析与规范意义结合起来,将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认为都市性是由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带来了都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压迫与解放的观念。

二、都市的集中性

资本主义的都市性表现之一是都市的集中性,但它剥夺了都市居民的生活权利。从直观上来说,都市和乡村最大的区别是集中与分散。都市的集中性除了受制于都市空间的自然禀赋,主要是都市资本和权力的所有者通过城市规划塑造的结果。都市是资本主义市政当局、规划机构等相关部门规划成具有构成性、标志性、纪念性、炫耀性等不同类型的中心,也是各种人财物等资本要素的同时性集中。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发达阶段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资本主义都市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集中性体现在“它并非那种把内容积累在一起意义上的事物形式的总体性;而是思想方式存在的总体性”^[6](P197)。它不是简单的还原(总和、叠加、综合)或者反映(主观性的幻想和客观性的幻想),而是以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的方式存在,列斐伏尔称之为都市实践,即“都市的形态、功能和结构”^[6](P19)。经过相关部门的城市规划之后,都市形成了组织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形态,并呈现出将各种要素聚集到城市平台的结构,具有维持城市大资本家统治等方面的功能,从而形成了都市的集中性。

城市规划对都市空间生产起了首要作用,都市形成了组织生产和生活的中心形态。城市资本家在都市空间生产之前的首要前提是进行城市规划。按照空间性质来分,城市规划的空间通常包括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作为城市规划对象的都市空间被视作一种生产力,即指物理空间、精神空间,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空间地理扩张、空间意识形态等形式实现了全球化的整合,可以实现生产力在数量、规模上的增长。同样,作为城市规划对象的都市空间也可以视作生产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包括从工厂生产到日常生活、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权力关系或阶级结构的分化或重组。城市规划对社会空间的规划,也是对经济基础或生产关系的规划,从根本上是为了适应生产力并发展生产力,以空间生产延续资本主义的有限生命。因此,都市空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作为城市规划对象能够组织生产。一方面,生产决定生活。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进而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因而生活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生活是生产的目的。生产本身是为生活而生产,因此生产与生活也是统一的关系。这同样意味着,作为城市规划对象的都市空间能够组织生活,都市空间本身也是生活空间的一部分。都市成为城市资本家凭借城市规划提升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组织生产与生活的工具。

城市规划同时还是生产都市构成性中心和去中心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具有能将各种要素聚集到城市平台的结构。“构成性中心……是一种聚集、集中和共时化的形式,……集中了一切财富、权力、权力者的财富、信息、知识、‘文化’等等”^[7](P83)。构成性中心是由资本和权力形塑成最符合加速资本积累的网络形式,它的形式是全体、堡垒、拼贴、混合、聚集、位置、马赛克,等等。这个被城市规划出来的构成性中心是城市资本家实践的结果。与构成性中心相伴随的是去中心化。为了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不同阶段获取利润,城市规划对城市中心作边缘循环式地改造。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尺度来看,它仍然具有能够将各种要素聚集到城市平台的结构。

城市规划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工具,是工厂政治在城市管理的延伸,具有维持大资本家统治等方面的功能。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斯塔尔·霍尔格森指出:“城市规划从来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嵌入到由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定义的政治经济学中。我们在讨论规范性和应当性时,应该从阶级这些社会关系入手。”^[8](P815)城市规划是介于国家政治与工厂政治间的中介平台。城市规划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城市空间领域的运用,从而形成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城市”。在城市土地自由放任的情况下形成了制约城市发展甚至国家发展的特殊利益集团。一旦由其中的开发商等土地利益集团形成垄断,将造成土地租金高、房价畸高的现象,这将会给工人阶级以及其他类型的资产阶级的利益造成威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规划正是协调不同利益集团关系、缓和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冲突的重要手段。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最终由各大财阀掌控,各大财阀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必然会通过各种手段干预城市规划过程,推动有利于其

自身利益的城市规划的落地,以维护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统治。但是它公开宣称的却是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这有助于统治阶级内部利益的合法化与合理化。

规划师按照“科学规划”的原则从事都市实践之后,都市的集中性形成了中心与边缘、工作区与居住区以及居住区住宅户型的各自集聚的对立。都市集中性的结果是,一方面,居住在城市中心与边缘的居民的生活权利受到了剥夺。城市资本家凭借在城市(社区)中的高房价、高地租获取高额的剩余价值,并且通过争夺对城市空间使用价值的使用权,以驱逐、排斥部分位居于市中心的居民。位居于边缘地区的居民,其生活环境也随着都市圈的城市规划进程而改变。他们居无定所、漂泊不定,生活权利难以保障。他们被规划到城市地理中心和城市权力中心的边缘,这些都决定了他们难以参与城市的规划、设计、监督以及实施等整个过程,难以对公共空间的城市规划具有协商、决定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规划将都市居民的工作区与居住区分隔出长远的通勤距离,消耗了他们大量时间和精力,损害了都市居民享有有质量的生活权利。两地分隔远,整个生活被碎片化,都市居民正式的家成为临时居所,一部分都市居民不得不在工作区附近寻找住宿的地方,他们难以参与社区管理,难以形成社区主人翁的意识。不仅如此,城市规划还将居住区的住宅户型分为大片独栋住宅与集体大规模住宅,这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9](P146-149)。

三、都市的扩张性

资本主义的都市性表现之二是都市的扩张性,它造成了都市居民生活主体性的丧失。城市理论家罗根和莫洛奇指出,谁控制了生产的政治,谁就有效地控制了城市^[10](P89),这突出了生产对城市的重要性。然而,生产和消费是辩证统一的,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从而消费和生产具有直接同一性^[11](P690-694)。生产直接是消费,是指生产要素的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是指产品的消费。城市空间的生产直接是城市空间生产要素的消费,城市空间的消费是城市空间产品的消费。通过城市空间生产要素的消费和城市空间产品的消费,都市实现了空间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都市集聚性造成的问题,也能够实现都市面貌的改变和都市快速发展。都市的构成性中心通过空间扩张聚集了“一切”和“所有”——生物、物体、实体、作品、符号与象征^[12](P148),它似乎具有某种超功能性。无论如何扩张,都市扩张本身也受制于空间的限制。马克思所说的“以时间消灭空间”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实质。“以时间消灭空间”中“空间”含义可以理解为物理距离。对都市扩张来说,物理空间(距离)成为障碍或界限,所以需要道路、交通、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来缩短流通时间,克服空间(距离)障碍,加快交换速度。至于“以时间消灭空间”中的“时间”,实际上流通时间增加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了资本的生产时间以及资本的价值增殖速度,流通时间不是创造价值的积极因素,因此需要缩短流通时间。对都市扩张来说,缩短其流通时间是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的主要方式。

为了加速资本循环和周转并获取本区域的高额利润,都市资本家除了通过上述缩短流通时间来加速如土地、人口、不动产等的流通过程,还通过各种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激发都市居民的消费欲望。土地、人口、不动产等的流通过程其实也伴随着消费的过程。因此,消费以及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推动都市扩张性的直接动力。都市居民满足了基本温饱之后,在非劳动时间和休闲、娱乐、教育、社会交往等领域形成相对趋同的消费方式,都市成为实现消费最大化的空间单位。因此,都市生活集中表现为都市的消费方式。都市资本家将都市居民相对趋同的消费方式视作资本增殖的手段,为了获取利润不择手段,利用各种营销方式,诱导都市居民非理性消费或过度消费,都市居民的个人消费被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操控。斯蒂芬·迈尔斯甚至直接指出:“城市实际上可以被视为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物质的与情感的表现。”^[13](P180)列斐伏尔是20世纪60年代第一位提出“消费受控制的科层制社会”的这个略显冗长概念的人,即资本主义社会是被组织化的消费社会。这说明列斐伏尔较为准确地把握到了资本主义进入都市社会阶段的都市生活特征之一。资本主义都市社会从以生产为中心转向以消费为中心的发展阶

段,从以工业化为中心转向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这些成为都市生活的主要推动力。虽然都市社会摆脱了工业社会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劳动异化,但是都市居民的生活却为消费主义所异化。“消费主义一般被认为是一种人工产品,迈尔斯(Miles, 1997)视为一种整体的‘消费资本主义’,它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依赖于消费所提供但不能派送的自由选择的幻觉。”^[14](P145)总之,都市本身就成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都市,即消费主义都市。正如前文所言,都市是生产与生活的集中,而消费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它不是消费主义都市。

首先,都市扩张性导致“成为你自己”的自我消费欲望弥散在人的主体意识和行动中,造成都市居民成为伪主体。他们自以为在消费天堂中自由选购,似乎每个人都有平等的选购权,并终于真正成为自己,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但这实则为了加快资本流通速度、满足利润最大化的再生产的需要而沦为主体幻象,幻象背后实则是人成为与商品同等处境的商品。大众媒体通过无孔不入的广告宣传,快速刺激人们的自我消费欲望,使人分不清真实的需要与虚假的欲望之间的区别,导致人丧失了选择商品的理性判断。消费者过度消费并沉浸于其中的感官享乐,把它当作反抗理性压抑、表现个人风格、凸显社会地位的手段。其次,都市扩张性导致消费主义的象征和符号充斥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市居民为其控制和摆置,人丧失了尊严和地位。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技术性和功能性的对象不具有绝对实在性,现实的物质世界为消费主义的象征和符号充斥。社会现实是象征和符号建构的不在场的现实,人们通过它来展现自己的特殊地位和独特品位。社会公众的生活已经成为异化消费的主要领域。消费品的身份象征和符号意义成为都市消费者考虑的主导因素,人反而扮演着卑微的角色。最后,都市扩张性导致决定消费主义私有制永恒性的论调盛行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都市居民成为单向度的人,人丧失了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也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到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的阶段,不是人操作机器或智能而是机器或智能操纵人、困治人,人为机器或智能“打工”而形成对资本的实质隶属。人不得不肯定剥削的“现实即合理”,商品交换的困难是任何所有制都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并学会调试资本主义节奏而放弃阶级斗争。无论他被都市扩张性裹挟到何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人被分配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他创造的价值,一些人却误以为高工资、高福利就没有被剥削,资本主义的工资是永恒的规律。人被锁在拼命工作—激情消费—再拼命工作—渴望再消费的单一链条中。总之,这一切都促使人失去否定、批判和超越的维度,让其无暇思考这背后的社会制度原因与寻求超越这一制度的可能出路。

四、都市的差异性

资本主义的都市性表现之三是都市的差异性,它导致了都市居民的生活异化。此处并非说都市社会之前没有差异性,而是说都市社会具有人财物集中扩散的功能,它能将之前不为注意的差异性集中起来,将农业空间、工业空间叠加起来,将各种网络与流量交织起来,生成集中化的差异性或差异性的集中化,从而导致特定空间中差异性逐渐成为普遍性的现象。长此以往,这种差异性超过一定的尺度,必然转化成日常生活中由差异所主导的同质性。日常生活成为哲学家、社会学家关注的对象,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农业社会,日常生活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当地特色的生活方式;在工业社会,日常生活开始从传统领域中分化出来,表现为生产与生活的分离,私人事务与公共事务的分离,等等。日常生活能够被集中起来并成为研究的对象,主要源于都市社会集聚扩张的都市性。集聚扩张的都市性将日常生活从与传统的自然生活、工业生产中抽离出来,形成日常生活的哲学,从整体上来塑造都市生活,引导日常生活实践。尽管差异的要素被集中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让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丰富多彩,并形成一定都市区域的文化类型,但是,一旦集中扩张的差异性开始反过来对日常生活进行规划、消费和同质化,差异就成为特定区域的主导。集中扩张的差异性生活方式超出了生活价值的临界点,实现了生活价值增殖,如同商品的日常生活同质性将难以避免。每个都市居民都有获取差异性的生活权利,但

是差异性的生活权利是由掌握生活权力的城市资本家提供的,并用以满足生活的价值增殖而非生活本身,这就将给都市居民的生活带来压迫。

差异性除了是将差异性的内容集中起来并扩而张之,还存在集中扩张的都市形式本身孕育着分散收缩的差异性。在都市社会阶段,集中扩张的都市性通过城市规划、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人财物等全要素集中到中心,但这个转移过程又导致了其他区域出现了次中心的格局,这种都市内部殖民主义,即中心—次中心的格局处于非平衡性的平衡性结构。它的非均衡性表现为在短期内城乡、区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元对立,它的平衡性表现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实现均衡,这种看似悖论的结构源于空间生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互相调适。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去中心化并不能够分裂对称的结构关系,构成性中心与去中心化或集聚与分散是一体两面,均从属于都市社会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都市社会取代传统的工业社会成为主导社会形态,并将构成性中心和去中心化于一体作为研究对象,这种集中扩张形式是与其异化的状态——分散收缩的差异形式相伴生而存在的。

日常生活分散压缩的差异性同样压迫着都市居民。列斐伏尔说:“日常生活从根本上是与所有活动相关的,包含所有活动以及它们的差异和它们的冲突;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的地方,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在那里衔接起来,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的共同基础。”^[15](P90)通常意义上讲的作为闲暇时间的日常生活是与劳动生产分开来的,这恰好是潜意识逃避异化劳动的生活观的体现。列斐伏尔旨在从整体或总体来理解日常生活,他将日常生活分成三个元素:“工作、家庭和‘私人’生活、闲暇活动。”^[15](P28)在都市社会,分散收缩的差异性对日常生活的集中筹划、设计和符号化,日常生活被操纵和控制成符号消费社会,导致相互分离甚至对立的生产活动、家庭生活和闲暇活动成为普遍状态,都市社会人与人之间陷入分裂、疏远、孤独、压抑当中。

在工作方面,一是工作区与居住区分隔出长远的通勤距离,造成劳动者身体和精神的过度耗费;二是现在的劳动者均被压缩在劳动分工与技术分工的工作体制的狭小空间中,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独立于人而存在,人为其所控制。劳动者不是创造性的主体,劳动产品也不是彰显人的本质力量。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主要是源于“在以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无产阶级只是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只是‘机器的附庸’”^[16](P195)。每个人被技术分工体制拆解并分裂成不同部分和不同流程,每个人仅仅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对其他工作程序并不熟知,并且不能占有自己的本质。因此,在列斐伏尔看来,他们都不是“总体的人”或“完整的人”。当然,都市居民不仅渴望了解工作方面的整全知识,将自己从偏狭中解放出来,而且更需要用替代性的知识来放松。在家庭和私人生活中,都市居民可以通过消费暂时从工作的压迫状态中抽离出来进行放松,如包括点击色情图像或影片、概观各种艺术展览、快进言情小说或电影、喝着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但极少参加体育锻炼、沉迷于都市夜生活,等等,但是这些消费内容同样是被广告传媒诱导、由市场提供的。都市居民消费的主要目的是免于焦虑不安或精神的高度紧张,或是获得人际关系或社会资本的提升,然而这是被资本筹划而非自身创造的家庭和私人的幸福感,会造成个人的孤寂感和亲密关系的疏远。这意味着,在闲暇活动方面,劳动者要通过“去远方”等人为分离的方式来到一个被挤压而人满为患的旅游空间,暂时远离工作、抛开家庭,获得个人真正的闲暇时光。个人可以获得发展个性的契机,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获取亲自体验的感性生活的能力,促使生活技术成为生活艺术,用以释放工作和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但是闲暇活动构造的虚幻世界更表征出现实世界的压抑的真实,“我们工作,用工作挣来我们的闲暇,闲暇仅有一个意义:离开工作。如此恶性循环”^[15](P37)。

五、都市解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都市性给都市居民带来压迫,让他们沦为彬彬有礼的“都市动物”,同时也蕴藏着解放的因子。列斐伏尔是运用青年时期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都市空间的首创者,其他都

市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其都市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列斐伏尔的都市革命作为都市解放的重点阐述。

首先,实现诗意的栖居和进入城市的权利。城市规划背后是资本增殖逻辑以及国家权力统治逻辑的城市表征。前者凸显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后者凸显了城市权利与城市权力的斗争,这两者统一于城市资本家的政治经济学。同样,这也是一套城市资本家的意识形态。因此,这里需要左翼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政治启蒙,揭示资产阶级关于城市规划的意识形态,揭露他们所谓的价值中立性,城市规划的旨归应该由为资本和权力服务转向为人的服务。城市是属于人的家园和栖居之所。住房从交换价值回归到其使用价值属性,它反对资本家运用市场对其使用价值的抽离,并且在其中也明确表达了使用价值的优先性。栖居成为都市实践的首要价值,差异性作为目的成为都市社会的主导。栖居的房子是都市居民占用而非占有以使用价值为宗的空间,用以反对其被资本主义市场私有化、商品化和抽象化。它并非是资本私有制下的私人占有,而是集体占用;它并非是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生产,而是回归到共同的兴趣去创造使用价值;它并非是工业社会强调的同质性的空间,而是可以按照自身真实需要改造空间使用用途的差异性的空间。都市居民集体占用,房子的产权归集体所有,并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创造,按照实际用途去改造空间,都市居民的生活才能实现诗意的栖居。

都市革命还要解决城市权利与城市权力的问题。如果城市权利指涉的是城市里居民享有的权利,那么这里的重点是权利而非城市。列斐伏尔重点要突出的是权利的城市性或空间性,因此,他认为城市权利是 the right to the city,直译为“获取进入城市的权利”而非权力。都市居民具有选择空间、创造空间、进行空间生产、空间分配的权利,等等。空间或城市本身成为资本主义增殖的生产工具,也是获取权利的场域。这种观点的实质仍然是将城市或空间视作一种工具理性。但如果不改变空间或城市的私人性质,而仅仅去争取在城市中享有的权利,那么这种方式实质上是功能上的错位。因此,列斐伏尔强调了城市权利的集体属性^[17](P78)。城市权利的集体性,是资本家、政治决策者、城市规划者、都市居民等各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负面清单来说,它反对政府或国家运用公共政策或政治权力对城市权利空间的压缩,也反对城市规划者对都市居民生活方式的干涉。同时,都市居民能够参与城市的空间规划、设计、监督以及实施等整个过程,特别是对涉及公共空间的空间规划具有协商、决定的权利,它试图从国家领域分出部分权力返还给城市所属居民,从政治上强调国家权力与都市居民之间争夺城市空间规划的掌控权。“与通过国家机构过滤公民声音的自由民主选举权的性质不同,城市权利将使居民直接贡献出产生城市空间内部的所有决策。”^[18](P102)尽管城市权利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权利的政治企图,具有激进地理学的特征,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19](P141-154),但是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都市革命只是自治分权而非夺取整个国家政权。

其次,揭露和反抗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工业的无组织社会走向了被组织化的消费社会,它是一个符号的消费和编码成为主导的社会。都市的集中扩张形式为消费的聚集与推广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它成为消费的空间平台和景观社会。资本主义推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主要是通过都市空间来实现生产关系再生产。因此,都市革命必然包含着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揭露和反抗。虽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造成都市居民在生活中的主体性丧失,甚至成为伪主体,但我们不能直接从主体性的视角去揭露它,而是要从符号和编码等领域来分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制造匮乏,被各种消费符号牵引,使匮乏感去占领、俘获消费者,制造更高级的消费符号,使消费者保持永不满足的状态,让消费脱离实在的现实指涉物,从而区分不了真实的需求与假装的欲望。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次体系实现了符号—想象的假装倒转或替代真实的目的,从而,假装成为在次体系控制世界中具有符号价值的身份炫耀。次体系无非是高度技术化、专业化的活动体系;某些科层等级结构;信息载体^[20](P331)。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消费领域的异化,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被符码化和等级化,一切社会关系由符号的象征价值来衡量。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充斥着符号—物体系的符号拜物教社会。

列斐伏尔主张用都市的文化革命来反抗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指认的文化革命“不是建立于文化基础上的革命,也不是文化自身的目标或它的动机……我们的文化革命的目标与方向是创造一种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风格的文化;它的基本特征是在哲学精神中来实现哲学”^[21](P203)。列斐伏尔的文化革命是关于都市居民生活主体性的根本性变革,正如他在《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的意图那样,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与被决定的二元关系,反而强调消费—文化在都市斗争中取代马克思主义首要的物质生产实践的作用。文化革命并不是都市的政治、经济革命的延伸,相反,文化革命是其先导,两者需要互补起来,以文化哲学的总体性形式融入都市生活中,共同对抗资本逻辑和科层体制的同质空间。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建立都市社会都市居民的生活主体性,它可以分为个人与社会的否定性和肯定性层面。前者从否定层面来说,在法律和道德风俗的范围内,个人的生活方式能够免受他人干预;前者从肯定层面来说,个人是自身生活的主导者,能够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后者即所谓的都市法则,它也包括否定性和肯定性两个方面,一是打破经济量的增长的盲目崇拜,反对权力造成的分化或隔离,否认夸大文化上存在的特殊性冲突。二是尊重社会风俗,创造空间—时间的统一体,反对强制性和同质化的生产与实现企业的区域自治^[6](P203-206)。

最后,都市居民自我否定对异化的日常生活的认同,重新发现它的鲜活性或创造性。城市规划对都市居民生产与生活的干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对都市居民消费领域的侵蚀,它们均成为都市生活方式异化的直接来源。前两者最后仍然要落地于对都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的压制。为了真正发挥效用,上层建筑除了依靠强力,还必须依靠都市居民自身的都市自觉性,即自觉认同异化的大都市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不是政治或经济领域,而是一个社会文化领域。它本身充当了都市居民自觉认同异化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的前提。一旦他们认定了日常生活具有分裂、疏远、孤独、压抑的特性,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异化的都市生活的事实。列斐伏尔的思路是让总体性哲学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鲜活性或创造性,并提出了“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鼓舞人心的口号。

列斐伏尔辩证地指出了日常生活的消极性与积极性。“一方面,被当做支配手段的日常生活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组织的异化场所,另一方面,日常生活被理解为通过人的创造性行动推翻压迫,实现一个乌托邦裂痕的可能性,这两方面存在着张力关系。”^[22](P174)沉沦于异化的生活与走出异化的生活是同一条道路,日常生活是可能性的起点和终点。日常生活批判需要展望历史的瞬间。瞬间是日常生活连续性、重复性的断裂,是差异的普遍性的打破,而日常生活是滋养瞬间的土壤。瞬间在尼采的酒神精神冲动下,以节日的狂欢的形式,走向自我创造和普遍性价值毁灭,并从日常生活中超拔出来,实现感性欲望的解放。日常生活批判则是肯定它的积极性,否定它的消极性,实现向总体的人转变。总体的人即主体的辩证性,它是黑格尔“异化的扬弃”、马克思的“总体人”、尼采的“超人”的结合体。在列斐伏尔看来,生产实践的总体性,自然和社会的决定论,总体的人,是它历经“三元辩证法”的环节。这是一个永恒轮回克服人性欲望、生活异化的过程。日常生活批判呼吁日常生活与艺术、审美结合,形成一种具有生机活力的生活,以诗性创造来反抗日常生活异化。艺术的创造是通过对生活和艺术的双重革命,实现生活与艺术的融合,即艺术的生活与生活的艺术。日常生活与审美结合,审美实现了对分裂、疏远、孤独、压抑的瞬间性的升华,即分裂转化成发挥专长,疏远转化成尊重空间,孤独转化成自我省思,压抑转化成积蓄力量。审美也实现了对自我意识与实体、人类与自然界的融合,它体验了周遭的真实,寻求了改变日常生活的实践,实现了审美的生活与生活的审美的统一。总而言之,瞬间、总体的人、诗性创造都要求都市居民超越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生活方式而进行自我生产、自我负责、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

六、现实启示

都市居民的生活压迫和解放是都市性的一体两面,都市性本身是对资本主义都市社会的反映,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尽管这一理论富有启发性,但列斐伏尔主张的都市革命并没有出现

像法国巴黎公社和俄国彼得堡的十月革命的政权，根本原因是都市革命没有诉诸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厂空间的私有制以及阶级权力进行革命与夺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倡导的都市革命只能是不彻底的都市斗争，从属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都市文明，而直接原因在于仅从城市规划、消费主义以及日常生活三个层面展开都市斗争，没有看到都市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方面形成的有机整体。

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正引领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有责任、有能力也应该走不同性质的都市文明道路。中国当前正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都市文明道路。这与资本主义都市文明性质不同，它包括都市的“五位一体”文明，即经济、政治、精神、生态和社会文明。

中国必须走都市经济文明之路。都市经济文明，即都市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经济生活的进步。都市具有聚集经济要素的形式和结构，还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但为了追逐利润，都市盲目的空间扩张将引发消费主义甚至浪费现象。都市集中扩张性并不是数量上、规模上越大越好，也不是速度上越快越好，而是都市生产和消费的高质量与高效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前我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都市文明建设必须以新发展理念来指导都市空间生产与消费。创新是引领都市发展的第一动力。都市空间的生产和消费必须树立创新理念，不断推进都市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协调是都市持续健康发展内在要求。都市空间生产和消费必须树立协调理念，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工业化与都市化协调发展等。绿色是都市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都市空间生产和消费必须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提倡绿色生产、理性消费，反对铺张浪费。开放是都市繁荣的必由之路。都市空间生产和消费必须树立开放理念，在全球城市竞争中提升中国都市的生产者服务业的比重，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的小圈子中争夺全球都市竞争中的话语权。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都市空间生产与消费必须树立共享发展理念，防范都市的过度资本化，防止都市成为少数人声色犬马的游戏猎场与感官宴会。

中国必须走都市政治文明之路。都市政治文明，即都市的社会政治实践与政治生活的进步。都市政治文明的正确道路，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都市政治文明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都市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党建引领都市政治文明建设，将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落实到都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权力三分的都市治理过程中，并将都市治理当做一项系统工程，遵循都市发展规律和都市治理的实践逻辑。规划由党委集中统一领导，推进规划由都市规划走向“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注重人民的整体利益。都市建设由党组来协调，注重各方参与、协同推进。都市管理由纪委与监委负责监督，防止都市管理技术为恶，防范都市风险，保障都市安全，注重管理精细化和智慧化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居民的整体利益。人民当家作主是都市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中国都市文明建设的动机和目的、过程和结果是人民当家作主，而非现代西方社会的少数人当家作主。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习近平提出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贯彻到都市政治文明建设中来，这就要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都市居民的生活权利。这种生活权利既是本地户籍居民也是外来人员都有资格参与居住区的都市治理，也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都市政治生活的全过程。比如说，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贯彻到空间规划中，保障人民享有空间规划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都市治理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都市治理需要向制定国家法律的形式那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以法律的形式要求都市治理体系的成熟与稳定，这也反过来促进都市治理能力的提升。考虑到目前大都市问题的复杂性和迫切性，将来这个问题仍然是实现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风险源之一，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单独制定一部《大都市法》或《超大城市法》，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探索的话题。

中国必须走都市精神文明之路。都市精神文明即都市人民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的精神成果总和,体现了都市人民文化生活的进步。每一个都市都有它自身的文化,都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成果是都市精神文明。走都市精神文明之路,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来展开。其一,要求大力倡导都市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通。社会主义的都市文化是现实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广泛动员,依据所在地的历史传统文化提炼出现实的都市精神,这能够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更好的结合。比如说,武汉市结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800年文化,振臂一呼的“首义精神”,凝练出武汉的城市精神是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武汉的城市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相互契合、相互融通。其二,要求大力加强革命文化对都市文化的领导。社会主义的都市文化是市民文化,革命文化是无产阶级或人民群众的文化。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是我国的根本制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这也意味着都市的市民文化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的领导。其三,要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引导都市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丰富,从其中凝练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表达,也是我国社会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都市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丰富多样,有先进文化,也有落后、腐朽文化。这就意味着都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防止都市文化的性质变质和方向走偏。

中国必须走都市生态文明之路。都市生态文明,即都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将目光投向了都市的生产、生活和消费,但是生态为生产、生活活动提供服务的潜能和安全屏障。人类创造了都市,但都市也存在并融入自然界当中,具有自身的生态平衡体系。都市的生态环境比以往要更为脆弱,原先治理都市生态,将都市空间视作物理空间,考虑的是技术和利润的物化空间,没有考虑到都市空间的精神性和社会性。因此,新时代都市生态文明之路是都市空间的物质、精神与社会三位一体的文明之路。就都市空间的物质方面来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依赖城市化的空间格局所覆盖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都市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体、有机体,城市空间相对于自然空间而言是人造空间。人造空间的规模既取决于当地的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也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习近平指出:“城镇化受自然条件制约,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约,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23](P591)这就要求对都市空间的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对其环境进行科学保护。就都市空间的精神层面来说,实现都市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这就要求都市居民的生产与生活要融为一体、生生不息。都市生态的理想是成为一幅山水画的集体作品,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使人的生产、生活空间相融。都市是城市居民共同生产创作的集体作品,每个人都在城市山水之间挥洒笔墨。都市空间作为人造空间的一种类型,彰显了人的能动和创造精神,人的这种精神也是对自然(天道)的一种反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的精神不仅反映天道,而且应效法自然,在都市生活中也“自然”而然。就都市空间的社会层面来说,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都市需要保有社会历史文脉的独特传承。都市空间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人类实践的集体记忆。都市的社会历史文脉是集体记忆的生动表现。有了社会历史文脉的独特传承,就能够形塑地方都市的文化特性。个人在空间互动中形成地方感、归属感或认同感,从而能够增强所属都市的社会责任感,同时都市空间也为个人提供了发展舞台和精神依托。这就要求人们尊重并保护都市的社会历史文脉,传承发扬都市历史文化。总之,都市空间是一个整体,需要重视其物质、精神与社会属性、生产、生活、生态而统一。习近平明确指出:“城市发展要把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24](P88)

中国必须走都市社会文明之路。都市社会文明建设的基本着力点和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随着经济社会水平的不断发展,民生的概念不断深化拓展。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25](P9)。当前我国民生问题已经从最基本的生

存、生活问题转变为关注美好生活问题。笔者认为美好生活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适当的生活成本和赋予的生活权利。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让都市居民身心受到损害。因此,个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可以从运动、饮食、情绪、睡眠、烟酒、体重等维度来把握。强调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生活本身的鲜活性或创造性。美好生活不是与现实相矛盾的理想生活,而是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现实生活,只有自己沉浸其中才能感受生活的脉动和音符的跳跃。高昂的生活成本让都市居民过着看似体面、实则艰辛的日子。居高不下的房价、物价让都市新移民压力巨大。政府应该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底线,加强住房、租房市场改革,稳定物价,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个人应该拒绝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合理消费、勤俭节约。丧失的生活权利则让城市居民成为城市的过客。与工业社会的生产权利相对,人除了具有劳动生产等方面的权利,都市社会在此基础上还有生活等方面的权利。生活权利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参与和占用的城市权利、空间生产的权利以及空间正义三个方面。这些新型的生活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障。

总之,西方社会的都市文明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文明形式,已经日益暴露出它的根本弊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制度,应该走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都市文明道路。我国都市的“五位一体”文明道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都市经济文明道路为其他领域的都市文明道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他领域的都市文明道路为都市经济文明道路提供了精神动力、政治保障、社会条件和生态环境。都市的“五位一体”文明道路的根本任务是推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都市的全面发展与进步。都市的“五位一体”文明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都市发展的体现。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都市文明之路,必定能够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都市范例的新篇章。

最后,我们需要辩证地看待西方社会的空间生产带来的都市性问题。它一方面带来了高度发达的都市文明或城市文明,一方面也给居民带来了压迫。这种压迫实质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都市性上的体现。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希图通过都市革命去解决都市性问题。尽管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至少提醒了当下中国必须警惕并超越资本主义都市文明道路。西方社会的都市文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西方都市的“里子”并不像其“面子”那样光鲜亮丽,并未让大多数普通人民过上美好生活。中国当前的城市化率正以每年平均百分之十的速度推进,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站在大历史观的立场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化所取得的成就是主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的都市化必须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都市文明道路,坚持在都市化的发展中解决现实问题,这正是创造人类都市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试验。

参考文献

- [1] 包亚明. 现代性与空间生产.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 [2] N. Brenner, S. Elden. Henri Lefebvre in Contexts: An Introduction. *Antipode*, 2001, 33(5).
- [3] 陈忠. 城市现代性的政治逻辑: 历史转换与伦理趋向. *哲学研究*, 2014, (9).
- [4] D. Pinder. Reconstituting the Possible: Lefebvre, Utopia and the Urban Ques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3, 39(1).
- [5] 邹诗鹏. 城市际性与都市一体化. 探索与争鸣, 2019, (8).
- [6] 列斐伏尔. 都市革命. 刘怀玉、张笑夷、郑劲超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7] 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 李春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8] S. Hølgersen. On Spatial Planning and Marxism: Looking Back, Going Forward. *Antipode*, 2020, 52(3).
- [9] 鲁宝. 空间生产的知识: 列斐伏尔晚期思想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 [10] 艾伦·哈丁, 泰尔加·布劳克兰德. 城市理论: 对21世纪权力、城市和城市主义的批判性介绍. 王岩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2] 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 刘怀玉等译, 孟锴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13] 斯蒂芬·迈尔斯. 消费空间. 孙民乐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 [14] 阿德里安·富兰克林. 城市生活. 何文郁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3.
- [15] 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 第1卷. 叶齐茂、倪晓晖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16] 列斐伏尔.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 [17] 刘勇. 都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空间斗争——以列斐伏尔、爱德华·索亚为线索.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3).
- [18] M. Purcell. Excavating Lefebvre: The Right to the City and Its Urban Politics of the Inhabitant. *Geojournal*, 2002, 58.
- [19] M. Purcell. Possible Worlds: Henri Lefebvre and the Night to the City.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4, 36(1).
- [20] 刘怀玉. 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21] Henri Lefebvre.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4.
- [22] Francesco Biagi. *Henri Lefebvre's Critical Theory of Space*.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 [2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3卷.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0.

Urbanity of Western Society and Its Implications

Liu Yo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urbanity of Western society contains the dialectics of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At the urban society stage of Western capitalism, the forms of space production in urban society include urban planning, consumerist ideology, and everyday life, which jointly produce urbanity, namely, concentricity, expansionarity, and inhomogeneity of cosmopolitans. Urban concentricity has deprived urban residents of their rights to life, urban expansionarity has caused the loss of the subjectivity of urban residents' lives, and urban inhomogeneity has led to the alien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lives. The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that have occurred in the city are a contradiction characteristic with unity of opposites. Urban residents rely on the urban revolution to achieve the liberation of their lifestyles to a certain extent so as to realize "poetic residence"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expose and resist consumerist ideology, propose the "self-denial" of the alienation of everyday life—self-denial identification with alienated everyday life, and rediscover the vitality or creativity of everyday life. The space production of western urban society has created a highly developed urbanity civilization, and also brought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to urban resident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o stick to the path of socialist urban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urb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Lefebvre; space production; metromarxism; urban planning; consumerism; urban civilization

■ 收稿日期 2021-10-23

■ 作者简介 刘勇, 哲学博士,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 广东广州 510275。

■ 责任编辑 涂文迁